



「九三」勿忘國恥 增強志氣骨氣底氣



議事論事 何志平

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這一天，對於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有着極為重要的意義。同胞逝去之傷，山河破碎之痛，永不敢忘！尤其是香港市民，更要牢記香港從1941年12月25日「黑色聖誕日」伊始所歷經的「三年零八個月」日佔黑暗時期的苦難。

我們不能忘記，十四年抗戰，全國近4000萬同胞死亡，大半個中國被日軍踐踏，930餘座城市被佔，4200萬難民無家可歸。

我們不能忘記，1941年12月8日，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並進攻香港，守衛香港的英軍僅僅抵抗了18天，時任總督楊慕琦就宣布投降。日軍在「大假日」全城搶奪，燒殺淫掠，無惡不作。日本侵略軍駐香港副總督平野茂後來在回憶錄《我們在香港的苛政與暴行》中寫道，日軍對香港

人「進行了殘酷的掠奪、搶劫、殺人」，「港九的街道上還有許多屍骸未曾清理」，「海面上浮着數不清的屍屍」。

不能忘記歷史的痛和屈辱

我們不能忘記，近四年的日本軍事侵略統治，香港遭到空前浩劫，社會秩序崩潰，民生停滯，人口銳減，經濟凋零。民眾飽受壓迫的同時，黑社會作亂，一些商人炒貨居奇、小偷強盜橫行等亂象，更讓百姓生活如煉獄。我的祖輩則居住在九龍油麻地，我的祖母在1941年12月初剛分娩尚未出月子，家中一周內就被暴徒「勝利友」強行入屋洗劫了十多次，祖母被迫拖家帶口逃生。他們大大小小十四人先是千方百計地從油麻地躲到九龍塘的朋友家暫避，兩天後再從九龍塘步行到大角咀海邊上了一条漁船，最後前往澳門荷蘭園逃難了三年又八個月。待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重返家園，早已是面目全非，產業盡失，一家人只能棲身於一層的舊唐樓及天台裏。據估算，當時因戰爭至少有5.5萬人死亡，還有約100萬人

被迫逃亡，踏上「無家可歸的要飯之旅」（途中因飢餓、傷病等死亡人數無法統計），香港總人口也由1941年的160多萬跌至約60萬。

我們不能忘記，香港的淪陷及民眾的苦難，不是日軍勝了，而是英國雙手把香港奉上，來減少自己在遠東戰場的負擔而已！有紀錄顯示，英國陸軍部早就認為香港無法進行軍事防禦，卻依然命令香港駐軍（以印度和加拿大士兵為主）強力抵抗。無非是英國人老早便打了輸數，也準備放棄香港了，只是慷了加拿大的慨，來給自己充面子。殖民管治者的原則，永遠是以自身利益為本，跟所謂的民主、人權、自由一點關係都扯不上，全都是虛偽騙人的口號和遮羞布而已！香港人，只不過是殖民管治者利益考量之下的奴役衍生品和犧牲品！

我們更不能忘記，在這艱苦卓絕的歲月，有一支由600多名進步青年和香港愛國民眾組成的港九大隊（東江縱隊九獨立大隊），一直戰鬥在香港的山水間，頑強抗擊着日本侵略者。他們根據中共中央

指示，特設國際工作小組開展了廣泛的國際合作，是這「三年零八個月」中香港唯一的一支抗戰武裝力量。他們與二戰東戰場盟軍建立起情報合作，先後營救了89名國際友人，並幫助盟軍準確摧毀了日軍在啟德機場的機庫和香港海面上的補給艦船等；還協助何凝凝、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茅盾、梅蘭芳、胡繩等800多位滯留香港的文化人和愛國民主人士擺脫搜捕，逃離險境。

如今七十九年過去了，那刻骨銘心的痛和屈辱，我們不能忘，不敢忘，不會忘！習近平主席說，「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歷史、現實和未來是相通的。只有真正了解香港百年殖民史的血淚滄桑，深入認識本地游擊隊當年抗擊侵略者、反法西斯的英勇行為，才是真正的尊重本地歷史，徹底洗刷殖民者帶給港人的深重國恥。

真心認同並熱愛我們的國家

所以，「九三」紀念日，我們追憶「雄關漫道真如鐵」的昨天，懷念緬懷中

華兒女為國為民為天下蒼生的精神大義，以及中國人永遠打不死、壓不垮的民族精神；我們闊步「人間正道是滄桑」的今天，不忘初心，對比照與警醒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七年來整個社會的發展變化和成就總結；我們奔赴「長風破浪會有時」的明天，香港如何自我革命未來會更好？如何讓香港市民以及青少年走出歷史區隔，自覺增強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真心認同並熱愛我們國家？如何讓新時代的年輕一輩懷「國之大者」，「為理想而執著，因理想而無所畏懼」，積極面對人生，走好腳下的路？

此時此刻，感恩先輩，緬懷英雄先烈，致敬仍在風雨中昂首前行的中國！振興中華，吾輩自強，我們每一個人，今日，每一日！一些香港人，你醒了嗎？那些睡著的，不管是真睡還是裝睡，怎樣都叫不醒。最終睜眼醒來的，也只能是痛，痛上加痛，痛過之後的痛定思痛，才會醒過來！

歷史的苦難，鞭策着今日的步伐，走出明天的康莊大道！

積極主動求變 精準調整定位



林筱魯

香港在國家發展的進程中，一直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從成功突破西方的封鎖，到成為引入外資和技術的橋樑，再到助力內地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嶄露頭角，香港均發揮了獨特作用。然而，伴隨着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演變，香港必須精準地調整自身定位，才能夠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一如既往地貢獻國家發展。回顧歷史以洞察今朝、展望未來，或許我們能夠從過往的歷程中，探尋香港在國家未來發展中的角色定位。

1950至1960年代，新中國剛成立，面臨許多艱難險阻。香港憑藉獨一無二的地理位置和特殊角色，在助力國家突破封鎖各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步入80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強勁吹拂。許多香港企業率先響應國家號召，帶同資金、技術以及經驗，到內地投資設廠，在得益於政策紅利，壯大自身發展外，並將前沿技術引進內地，提升產品質量，香港發揮了「引進來」「走出去」重要作用。

適應時代需求不斷革新

在「引進來」方面，香港作為內地與世界之間的橋樑紐帶，讓不同國家更深入地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蘊含的巨大市場潛力，成功吸引大批外國企業關注並投資中國，許多外國資本透過香港進入內地各個產業領域。在「走出去」方面，香港也為內地的產品和服務，打造了一個高效的銷售平台，借助香港這平台走向世界，拓展國際市場。不論是內地的工業製品，還是特色農業產出，都憑藉香港打入國際市場。

1990至2000年代，中國繼續堅定不移地向世界敞開大門，積極與國際接軌，更積極尋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力求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此期間，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顯著地彰顯其關鍵角色。香港為內地企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融資管道。同時，香港的金融機構積極主動參與內地的金融改革，為內地金融體系的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專業人才、風險管理理念，創新金融模式，為內地金融市場注入活力。

在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領域，香港與國際規則接軌的優勢，助力國家在知識產權、服務貿易開放等相關談判中更好地把握尺度，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在貿易領域，香港的港口和物流體系為內地貨物的進出口提供了高效便捷的通道，強有力地拓展了國際市場，大大推動了內地貿易的快速發展。憑藉其開放的資訊環境，香港能夠適時為內地傳遞國際市場的最新動態和先進技術，這有助於內地企業緊跟世界發展的潮流，並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與產品品質。

2010年以後，香港持續為內地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和通暢的融資管道。內地企業透過在香港上市的数量呈現出明顯的成長態勢，由此獲取了充裕的發展資金，這清楚地反映出內地企業對香港資本市場的重視程度和利用效率在不斷提升。

由上述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從來不是一成不變：在國家改革開放40多年歷程中，從最初純粹「賺差價」的買辦，逐漸轉變為一個「銷售平台」，讓內地和外地的企業能夠擁有一個提供一站式服務的站點，便於尋找買家和貨物，然後逐步轉型成為為國家帶來技術、資金的直接投資者；隨後更是升級至作為一個「聯通平台」，引進外國的資金、技術、人才，為內地企業、外地企業，

扮演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在這轉變過程中，香港不斷適應時代發展的需求，展現強大的靈活性和卓越的適應性。歷史告訴我們，這是不斷革新求變的成果。

發揮優勢助力打造「中國標準」

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以及全球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香港的「聯通平台」角色只會愈發關鍵和重要。但同時，也需要因時制宜地作出調整與優化。國家已經由「世界工廠」的角色實現了華麗的蛻變，「中國製造」已經由「平價貨品」成功轉變為「價廉物美」；由OEM、「仿製品」模式發展出了具有競爭力的「中國品牌」；「中國智造」已經演化為「中國創造」，並在許多方面領先世界。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需要思考如何更好發揮自身優勢，強化平台功能。這個平台的內涵，絕不能只停留在「左手交右手」的模式。

香港擁有世界各主要經濟體密切接觸的豐富經驗，加上我們對中華文化有着深入傳承。因此，香港除了擔當中國品牌的展示平台外，可否更加主動地為中國產品創造需求、建立良好的信譽，助力打造「中國標準」，說好「中國故事」？答案是肯定的。

香港可以利用豐富的國際商業經驗和廣泛的人脈資源，積極主動地發掘外地企業的需求，深入了解內地企業的優勢，廣泛分享「中國創造」的成功案例和令人矚目的技術突破，大力提升中國產品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和信譽。透過這樣的積極舉措，也能夠制定和推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行業標準，讓「中國標準」在全球範圍內獲得更廣泛的認可和應用。

香港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關鍵在於我們需要由過往讓市場自然求變的被動思維，迅速轉至以為政府結合高效市場的積極主動求變思維。立法會議員

打造大灣區體育賽事



議論風生 陳克勤

2024巴黎奧運會內地奧運健兒代表團日前訪港三天，出席一連串的活動。國家隊在奧運場上表現卓越，健兒們勇奪40金27銀24銅，創造了境外參賽的最好成績。

自回歸以來，每一屆的奧運會後，中央都安排國家運動員訪港，與香港市民一起分享喜悅。國家隊在奧運會結束不久專程前來港澳訪問，充分體現出國家對香港的重視和厚愛。而國家隊亦同過往一樣，馬不停蹄參加各類互動，與香港青少年和各界充分互動，在訪問、交流中金句不斷，成為社會熱話。體育是凝聚人心的重要橋樑，亦是培養奮鬥精神、永不言棄向上精神的好平台。在上述兩方面，內地香港有着十分廣泛的互動空間和前景。

8月30日上午，國家運動員到訪體育學院，與香港運動員交流。一隊前往乒乓球場互動，另一組則與香港運動員挑戰劍擊、划艇等四個體育項目。活動後，有參與的體院學生表示，欣賞國家隊運動員，即使挑戰自己不熟悉的運動，亦會全力以赴，是有體育精神的體現。在另一場活動上，亦有同學讚揚跳水明星全紅嬋說話簡短幽默，分享具啟發性，讓他們思考如何面對生活中的逆境和挑戰時，有更大的抗壓力。

從此可見，這些互動不僅讓香港青年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國家隊精英，也讓香港青年可以從他們分享的經歷中，尋找到向前的動力。事實上，回歸以來，港隊與國家隊的互動十分頻繁。單車隊、乒乓球隊都恆常到內地訓練交流，在與各個省市高水平運動員的競技中，港隊的水平亦不斷提高，在各項世界大賽上為香港斬獲榮譽。可以說，香港精英體育能夠發展至現今水平，離不開國家對

香港體育發展的大力支持。

而這些交流與互動，目前主要是聚焦於專業訓練層面。未來，相關機構可以思考如何透過兩地運動員的公開互动交流，透過運動員之間的互相學習和相互認可，成為一段段兩地良性互動的佳例。例如「香港女飛魚」何詩蓓與「國家隊男飛魚」潘展樂，二人均是自由泳項目的世界一流選手，相信兩地熱愛體育的民眾，都期待見到兩位選手可以有更多交流，互相學習，一起進步成為更好的運動員和榜樣。

單車節可成為區域大型活動

另一方面，兩地在體育產業，特別是民間體育交流方面，仍有很大的合作空間可供探索。近年在內地興起了一股單車運動熱潮，成為城市居民最喜愛的運動之一。隨着越來越多地城市城市的拓展，「Cityride」大有取代「Citywalk」之勢，在城市周邊的新發展區，綠色的發展理念得以貫徹。在這些新區中，不僅有預留公園等綠化空間，亦建起專為都市人騎行休閒的「綠道」（環境優美的跑步、單車徑），深受內地城市居民喜愛。

在香港，新界地區單車徑發展較為完備，亦有許多單車民間活動和賽事，供愛好者參與。例如將於10月在沙田舉行的香港單車節，便是一個好例子。透過這些活動，香港可以吸引大灣區的騎友來港參與，藉此帶動香港新界地區的綠色休閒旅遊。更進一步，香港亦可加強與內地協作，將相關比賽和活動建立成為系列品牌，在大灣區其他城市巡迴舉辦，打造成區域性的大型活動。

筆者相信，兩地如能進一步加強體育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定能發揮「1+1>2」的效應。透過榜樣力量激勵更多青年，打造系列活動促進兩地交流，體育將成為兩地互相了解的最佳紐帶。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

行政立法互動更密切 公聽會非反映民意唯一渠道



最近有報道指，近年立法會召開公聽會的次數對比以往有所下降，有立法會議員亦表示，越敏感議題，越要聆聽社會意見，形容減少召開公聽會是「斬腳趾避沙蟲」云云。然而，公聽會的次數減少了，是否就代表立法會以至政府沒有聆聽社會意見？非也。事實上，公聽會從來不是諮詢民意的唯一途徑或標準，本屆政府在推動政策前，其實比起過往更加積極主動接觸各界人士，先形成基本共識再推出相關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公聽會次數有所下降，其實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不必小題大做。

舉行公聽會是徵詢公眾意見程序的其中一部分，但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公聽會並不是立法會和政府唯一有效的諮詢民意方法，更不應該只以公聽會次數的多少，來判斷政府施政究竟有多關注民意。比方說，現時立法會另一個較常用的做法，是

在官方網站刊載公告並發出新聞稿，就某事項邀請各界提交建議；立法會議員亦會按《內務守則》第32條所訂之安排，定期與區議員進行討論及交換意見；甚至鄉議局議員和香港主要慈善機構，也會舉行定期會議或茶敘；立法會議員更會定期跟社會領袖會晤交流，確保能深入了解社會各界對可能影響市民福祉及香港長遠發展的事宜有何意見。

現屆政府在聆聽民意的方式上，較以往其實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立法過程中，政府面向法律界、工商界、金融界、商會、專業界別等，在一個月內舉辦了近30場諮詢會，主動釋除各界人士疑慮，各類諮詢會多達3000人參與。行政長官李家超更聯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等專責官員主動出馬，在諮詢期接受傳媒訪問，主動回應外界意見，還針對外國領事、外國商會，主力釋除國際社會的疑慮。與此同時，不同政黨、民間團體亦舉辦了各種

簡介會及座談會，深入討論立法工作。這些大大小小諮詢的「含金量」，一點也不比舉辦公聽會小。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諮詢和立法過程，正好說明了公聽會並不是聆聽民意的唯一方法。現屆政府在推出政策前，相關官員或部門都會先主動接洽持份者或相關業界，爭取先形成基本共識，再草擬法案；然後再就細節事項進行具體討論。比如針對基建安全的《保障關鍵基礎設施（電腦系統）條例》、網絡安全立法、實施穩定幣發行人監管制度等等，以至最近行政長官就施政報告頻頻落區舉辦地區諮詢會，均是例子之一。

以往公聽會淪「政治秀」

因此，立法會公聽會數量相對減少，其實也是正常現象。因為基本共識已經達成，即使再舉行公聽會，也不過是重複一遍已有的意見，不但消耗立法會寶貴的會議時間，而且也拖慢政策落地的效率。

公聽會的次數多少並不與政府有多重視民意掛鈎，換個角度說，如果公聽會有不同團體出現了兩種極端意見，那政府選擇聽從其中一邊的意見，是算作聆聽民意還是不顧民意？

再退一步講，公聽會整體次數的減少，也不代表政府和立法會不再重視公聽會這種諮詢方式。例如相關報道中便提到，立法會就《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舉辦了三次公聽會，聆聽社福、醫療、教育界的意見。這就證明，政府和立法會並沒有放棄公聽會作為有效的諮詢途徑，在有需要的時候，公聽會仍然充當着業界發表意見的平台，為政府施政提出有價值的建議。

總結而言，現時的諮詢方式並不如個別議員想像般，「市民無機會表達」、立法會為了避免社會紛爭「斬腳趾避沙蟲」。越是敏感的議題，當然越要聆聽社會意見，只是聆聽意見的方式並不限於公聽會而已。事實上，在過去一段頗長的時間，公